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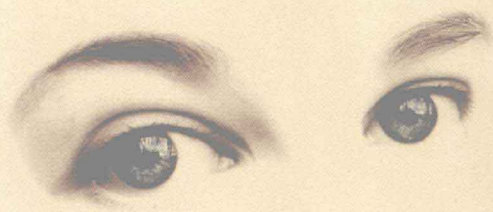


求索外语学术研究系列·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

并不柔弱的话语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

刘 岩 马建军等◎编著



BINGBU ROURUO DE HUAYU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之一，旨在向读者展现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景观。

编著者回顾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得失，运用批评实例展示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这一方法同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结合的可能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女性经验，书写女性历史，观看女主人公如何主宰命运，体察女性作家如何彰显女性主体。

在女性主义理论视域下细读女作家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历程，女性笔下书写的话语并不柔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 / 刘岩等编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0

（求索外语学术研究系列. 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5624-6084-8

I. ①并… II. ①刘… III. ①女性主义—英语文学—文学评价—世界—20世纪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7061号

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

刘 岩 马建军等 编著

策划编辑：杨 琪

责任编辑：李桂英 戴倩倩 版式设计：杨 琪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5 字数：274千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624-6084-8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序言 /01

第一章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17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沿革 /20

第二节 迈向女性主义的诗学 /38

第三节 女性主义、女人与女性 /42

第四节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52

第五节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生产 /61

第六节 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 /76

第七节 生态女性主义 /90

第二章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94

第一节 疯狂的颠覆

——菲·维尔登小说《魔女的复仇》的女性主义原型解读 /95

第二节 多重与流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中女性身份的复杂建构 /104

第三节 镜中的女性自我

——解读艾萨克·迪内森的《悲伤之野》 /113

第四节 身体书写的威力之书

——詹妮特·温特森《威力之书》中的女性书写 /122

第五节 男权规训下的女性身体

——保拉·沃格尔剧作的女性主义研究 /131

第六节 双性同体，阴阳和谐

——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中的女性乌托邦 /138

第七节 父权秩序的构建与消解

——琼·里斯《茫茫藻海》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145

第三章 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 /155

参考文献 /208

附录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扩展阅读书目 /228

序 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世界范围的女性解放运动（亦称“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的文学批评实践。同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学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阐释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文学阐释空间，它对文学作品所做的观察和发现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女性的生活状况，明晰作品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指出，文学批评可以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内部研究把文学作品视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包括格律、文体、意象、叙述、类型等修辞学范畴，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¹。外部研究则指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研究、传记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等，它关注文本同社会环境或背景的关系，也因此会更多地考察文本中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作者的性别以及作品表现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当属文学批评中的外部研究²。

世界范围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在受教育权、选举权、财产权、同工同酬等诸多领域力求保证女性同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有清醒的认识，并透视造成性别不平等状况的体制原因。她们认识到，父权文化并没有公正地再现女性历史，女性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抹煞，而没有在历史中得到恰当书写，女性文化也没有得到有效传承。因此，有必要重新发现女性的书写传统，重新书写女性文化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文学大量涌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在撰写美国

1 韦勒克等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序言第14页。

2 朱刚对此也有认同，参见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

文学批评史时，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¹：

- （1）批评阶段：揭露男性作品中表露出的性别歧视；
- （2）发掘阶段：重新梳理和评价女性作家的作品；
- （3）话语分析：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上升为理论话语。

这三个阶段相互交错并进，构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经纬。

上述三个阶段的批评类型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秩序。按照常规的思维模式，人们首先要对现有的（男性）文学传统进行批判，揭露男性作品如何歪曲了女性形象，如何依照男性标准和男性想象塑造了女性人物，以及如何表露出了性别歧视。继而，人们会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书写男性文学传统中未被记载的女性文学历史，以及对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女作家的创作给予新的解读和评价，用具体史实来支撑女性文化被父权文化抹杀的论点。这是一个重修“经典（canon）”的历史建构过程。女性主义者认为，现存的文学经典是以男性的价值为标准制定的，并未能反映文学传统的真实状况。她们对文学史的补充和修正引起一些男性学者的嘲笑²，但她们的努力毕竟让读者看到了镜子的另一面。然后，基于以上基础工作，学者才会在学科高度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进行理论化，总结出一套批评话语特征，从而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进入学科体制，在文学史上得到认可。在此问题上，应注意到这样两点：其一，研究者并不是集体放弃一种类型而过渡到另一种类型的，首先出现的类型可能仍会持续，被后来的类型加入之后，形成交错发展的局面。其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不满足于对传统的批判而慢慢放弃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导致单纯批判性的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少见，这也是事实。此外，一些著作兼有批判和挖掘的双重功能，很难把它们截然放置在一个阶段而同另一阶段相分隔。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1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30s to the 8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7. 朱刚认为，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容易产生误解”。考虑到这三个阶段并不是依时间顺序先后发生的，应该理解为“三个层次”更为准确。参见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盛宁也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舆论准备阶段，梳理女性文学传统阶段，以及理论总结阶段。参见盛宁著：《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1-223页。林树明也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揭露阶段，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追溯阶段，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阶段。见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盛宁和林树明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划分同里奇的大致相同，但在他们看来，这三个阶段是依时间顺序呈线性发展的。

也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读解批评的实践阶段和理论建设阶段。参见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08-609页。

2 肖瓦尔特著：《女性主义与文学》，戴阿宝译，《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第71页。

Gubar) 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9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著作着重考察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先驱——以简·奥斯丁(Jane Austen)、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为主要代表——在父权制文学传统的压迫下所经受的焦虑和困境,以及她们为建立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所选用的话语策略。作者试图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挖掘出这些19世纪的女性作家隐藏在男性文学形式下的女性话语和意识,从而达到构建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的目的。该书对当时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荣获当年美国的全国图书评论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至今仍然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的标志性著作。但作者在对19世纪女作家的书写进行描述和定义的过程中,对在此之前的男性文学传统也有批判。她们认为,父权制的文学传统塑造了“天使(Angel)”和“妖妇(Monster)”这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大力推崇纯洁、顺从、牺牲奉献、缺乏主体性的女性天使形象,另一方面把不肯屈服于父权、有能力学识、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妖魔化。因此,女作家才会出现普遍的“作者身份的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¹。可见,这部著作兼具批判和建构的双重目的。

虽然里奇描述的是美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貌,这也同样是定义其他国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节点。学界通常把西方女性主义分为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两大流派,这一划分源自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两大阵营对女性诉求的不同阐述以及迥异的理论生发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英美女性主义理论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特征,书写女性文学史,从而建立女性文化。法国女性主义采取理论建构的方式,从哲学和形而上学层面探讨作品的性别特征以及女性文化的理论基础,试图在理论层面为女性文化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样的划分有失偏颇²。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正式进入学界要归功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她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迈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1 参见刘岩等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7-244页。

2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ed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 129-130; Mary Eagleton, e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4-6. 另见刘岩著:《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a Feminist Poetics”）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¹的概念，提出应该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建立独立于男性传统批评模式的批评范式。1981年，肖瓦尔特在《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一文中进一步完善了“女性批评学”理论。她把“女性批评学”归纳为四种视角，即生理的、语言的、精神分析学的以及文化的，主张其研究范围应涵盖女性写作的历史、风格、主题、文体和结构，女性创作的精神动力，女性个人或整体创作经历以及女性文学传统。应该注意的是：肖瓦尔特的文章与其说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倒不如说是对已经出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描述和总结。在此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运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的文学批评实践已经散见于女性主义杂志，由女性理论家编撰的女作家文选也陆续面世。也几乎是在同时，女性主义的研究迅速走向学科化和体制化。在70年代初期，首批女性研究的课程在大学开设，后来发展为研究方向和专业。虽然此时学界在名称上还有待规范——“女性研究（female studies）”“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不一而足，但是，女性研究进入大学课堂又反过来促进了女性主义教材和研究著作的推广，女性主义杂志和出版社的兴起也为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渠道。这些努力奠定了女性主义研究作为学科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在大学里接受了女性主义理论教育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成为女性主义的实践者”²，致力于把人类社会推向更加公平、和谐的未来。

谈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者要明晰以下几种关系：

1. 作者的性别与作品的性别。作者的性别同作品的性别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男作家创作的作品并不一定就带有性别歧视，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一定就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理论上讲，男女作家都有可能创作出超越自己性别的文学作品，所以，研究者不能把作者的性别等同于作品的性别，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判断。法国理论家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特别区分了作者的性别和作品的性别：

……署上女性的名字并不一定保证这部作品就是具有女性特征的，这部作品完全有可能是男性写作。相反，一部署名男性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排除女性特征。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有时确实会在男性作品中发现女性特征，这种情况确实会

1 另见本书第三章“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之“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以及刘岩等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7-273页。

2 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0页。

发生¹。

诚然，由于女性作家对女性经验有更多直接的体会，对女性所处生存状况有更为深刻的洞见，对性别偏见也更为敏感，所以，女作家的作品相比男作家的作品而言更容易带有女性主义倾向。英国女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曾宣称，“女人写的东西总是女性的；它不能不是女性的；它的佳作亦是最为女性的；难只难在给我们所说的女性下定义”²。显然，伍尔夫已经注意到“女性”概念的多元内涵，极富创见。但在很多情况下，女作家的创作绝不等同于女性主义的创作³。对于是否有“中性”作品，大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持否定态度。她们更愿意认为，由于作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进入到文学作品，因此，作品必然携带作者的思想观念。这些有关性别的观念渗透在作者展现人物关系的方式，安排人物命运的方式，或者表现在作者叙述人物行为、再现人物对话的过程中，把这些蛛丝马迹串联起来从而发现作者的性别立场，这正是研究者的任务。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是较早关注女性生活状况以及两性关系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如《玩偶之家》（1879年）、《群鬼》（1881年）、《海上夫人》（1888年）、《海达·高布乐》（1890年）等剧作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剧作表现妻子、母亲等社会角色对女性生活的束缚，表现女性在经济尚未独立时如何处理同男性的关系，以及她们在寻求自主性的过程中遭遇的挫折⁴。易卜生对女性的同情以及两性关系的关注几乎贯穿他的创作始终，他的《玩偶之家》在20世纪初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激发了无数女性走出家门寻找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新女性”从此成为独立女性的代名词。身为男性，易卜生对女性问题格外关注，他为《玩偶之家》设计的娜拉出走的结局非常具有女性主义意味，它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也使这部剧作在世界范围常演不衰。这个例子也说明，作者的性别同作品的性别并非对应关系。

2. 女性书写与男性书写。不同性别的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是不是拥有不同的特征；女性书写和男性书写是否拥有不同的特质，是否也同时拥有一些相同的特质；作品

1 Hélè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 Annette Kuh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1 (1981): 52.

2 转引自肖瓦尔特著：《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韩敏中译，《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

3 Mary Eagleton, e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213.

4 关于易卜生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参见Joan Templeton, *Ibsen's Wo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udith E. Barlow, “O'Neill's Female Characters,” *The Companion to Eugene O'Neill*, ed. Michael Manhe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4-177; 以及刘岩著：《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41-107页。

是否有性别的差异，是否有必要区分男性书写和女性书写；在作品主题、写作技巧、叙事手段、语言运用上，不同性别的作家是否有不同的倾向和偏爱；当一部作品匿名呈现的时候，阅读者是否能够判断作者的性别……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者的回答也莫衷一是。即使是女性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大相径庭。莫伊（Toril Moi）就高调主张，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妇女写作的不同的标准”，但也有不少女作家不愿意被划归女性作家的行列，担心女作家这个标签会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而降低作品的价值或影响作品的接受¹。不管怎样，在女性主义理论家试图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时候，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体制内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时候，自然要在理论层面对女性书写做创新性描述和定义。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下，隶属法国传统的几位女性主义理论家²更是花费很大篇幅论述女性书写的特质。西克苏主张，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要以“给予”为重要特征：“无休止的欲望循环，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穿越及超越性别差异，处于家庭构成的权力关系和再生关系之外。……女性气质是在预期之外书写的，是无法预见的事物的文本”³。她认为，女性讲话时用身体，女性“从来就不曾远离‘母亲’”，因为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女性的身体。西克苏言简意赅地说：“女性用白色墨水书写”⁴。女性同母亲的纽带赋予女性以书写的动力，女性书写就是从母亲的乳汁中寻找灵感和力量源泉。她同时认为，女性书写的概念是流动的，超越任何定义或描述，超越现存的定义体系和知识秩序⁵。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把母性的力量理解为生命的力量，她借用柏拉图的“穹若（chora）”概念，代表母亲有

1 参见肖瓦尔特著：《女性主义与文学》，戴阿宝译，《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第71页。

2 引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有这样三位女性：西克苏、克里斯蒂娃和伊里加蕾，她们被并列称作法国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the holy trinity”）。参见Lynne Huffer, *Maternal Pasts, Feminist Futures: Nostalgia, Eth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iffer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 但伊里加蕾本人对此称谓并不认同。她认为，她们三人除了目前都居住在法国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女性主义主张和理论基础。参见刘岩著：“Feminism, Sexuate Rights and the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An Interview with Luce Irigaray,”《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9页。

3 Hélè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 Annette Kuh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1 (1981): 53.

4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trans. 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4 (Summer 1976): 881.

5 Mary Klages, <http://www.colorado.edu/English/ENGL2012Klages/cixous.html>, n. p., 3 Aug. 2010.

营养的身体，提供了作为符号的有律动的语言¹。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在基于大量语言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尖锐指出：“话语是有性别的”²。她提出*parler-femme*的概念，即*speaking (as) woman*，“说话的女人”，或“以女人身份说话”，主张女性要有能力回应他人的话语，要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欲望和需要³。可见，三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女性书写和女性话语的独特性都有共识⁴。

3. 女性书写与女性主义理论。不管女性书写是否具有同男性书写迥异的特质，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是可行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女作家更关注女性经验，通过女性视角（或者通过女主人公，或者通过作者本人的叙事视角）展现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而女性主义理论恰恰对女性经验具有独特的阐释能力，对女性生存状况怀有突出的关注。因此，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女作家的作品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是较为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女作家的创作和女性主义理论之间，我们常常发现关注对象、最终诉求、审美情趣和心理倾向上很大程度的契合。但在这个关系上，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女性主义理论也可以解读男性作家的作品。肖瓦尔特提出的“女性批评学”概念专指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女性写作进行的批评实践，她特别把女性批评学同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区别开来⁵，而后者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使用时不必考虑作家的性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早期致力于批判男性书写传统中的性别歧视，许多批评实践针对的就是男性作家的创作。其二，女性主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读所有女作家的作品。前文已经说到，并非所有女作家创作的作品都携带女性主义的思想，对于那些女性主义思想并不是作品主要思想倾向的作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显得乏力，甚至牵强。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运用到这样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势

1 克里斯蒂娃认为有“符号的”（the Semiotic）和“象征的”（the Symbolic）两种语言特征。她在《爱情传奇》（*Tales of Love*, 1984年）中透过自己怀孕的经历书写作为女性的愉悦，并形象地通过双排栏的对比方法让读者看到她所作的区分。参见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著：《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哲学述论》，金惠敏译，载《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春季卷，第144页。

2 Luce Irigaray,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trans. 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 Gill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 133.

3 关于伊里加蕾的女性话语与女性书写理论，参见刘岩著：《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87页。

4 关于三位理论家在女性书写方面所持观点的异同，参见刘岩著：《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4-194页。

5 肖瓦尔特著：《女性主义与文学》，戴阿宝译，《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第68页。

必把新的观念强加到作品或作者身上,造成文学批评中的过度诠释,甚至误读¹。2007年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就是一例。这位多产的女作家到目前为止共创作了50多部长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两部自传,以及大量诗歌、剧本、散文、文论和纪实文学作品,其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很多。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在陈述她的获奖理由时说:“她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象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从而登上了女性体验的史诗般巅峰”²。其后,研究莱辛的文章普遍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有些研究文章的结论为突出莱辛的功绩而把她塑造成女性主义的代言人,致使莱辛本人不得不多次出面澄清自己在写作时并没有刻意运用女性主义思想,她甚至对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颇有微词,认为女权运动太过于意识形态化³。即使对学界较有共识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年),莱辛也批评评论界过于注重作品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而忽视了主人公通过精神崩溃来治疗心理创伤的维度⁴。更何况莱辛其他作品展现了远比性别更宽广的题材——种族矛盾、殖民灾难、美苏冷战、原子战争、环境污染、心理疾病、精神危机、人类未来等,这些都远不是单一的女性主义视角可以解释的。

4. 研究者的性别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人们一直认为,文学批评是无性的。但自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学界,人们反观先前由男性学者编写的文学史或从事的批评实践,就发现研究者的性别意识往往在文学批评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对研究者性别的关注也从此开始。萨义德(Edward Said)说:“迄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能使学者

1 燕卜苏(William Empson, 1906—1984)在其代表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ie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30;周邦宪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亦译《歧义七型》,或《含混七型》)中列举并用大量文学实例说明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七种造成多重阐释(甚至歧义)的手段。在他看来,这七种类型的产生主要来自语言的运用,可以使诗歌的内涵更加丰富,作者有意无意的表达方法导致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读者和批评者那里构成了多重的阐释空间,也因此增加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应该看到,歧义手段在能够丰富作品内涵的同时,也会造成误解。读者和批评者的阐释并不一定同作者的意图相吻合,在有些时候甚至会歪曲作者的创作倾向。参见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ition (London: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10-11.

2 参见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7,” Nobelprize.org, n. p.,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7/index.html, 3 Aug. 2010.

3 2001年,莱辛荣获大卫·科恩奖(David Cohen Prize)。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极力为男人辩护,认为他们在女权运动中无法还击。参见“Doris Lessing Attacks Feminists,” *BBC News* (14 Aug. 2001): n. p., <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1491085.stm>, 3 Aug. 2010; 以及Fiachra Gibbons, “Lay off Men, Lessing Tells Feminists,” *The Guardian* (14 Aug. 2001): n. p., <http://www.guardian.co.uk/uk/2001/aug/14/edinburghfestival2001.edinburghbookfestival2001>, 3 Aug. 2010.

4 参见Lesley Hazelton, “Doris Lessing on Feminism, Communism and ‘Space Fi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25 July 1982): n. p., <http://mural.uv.es/vemivein/feminismcommunism.htm>, 3 Aug. 2010.

脱离生活环境,脱离他(有意或无意)参与的某一阶级、某一信仰、某一社会立场的事实,或脱离作为某一社会的一个成员所从事的纯粹活动”¹。带有性别意识的学者无法摆脱性别意识,他们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时,也自然会选用适合的性别视角。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男性不能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文学批评方法本身并没有规定使用者的性别。只要使用者认同这一方法,认为这一方法在解读某一文本、或解释某一文学现象时足够有效,自然就可以使用,正如新批评、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并没有限定某一性别使用一样。但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又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不同。由于它的基本立场对女性怀有更大的同情,假定父权文化贬低女性,所以,这种方法更容易获得女性学者的认同,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运用这一方法的女性研究者的人数也因此要多于男性研究者,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几乎全部是女性学者。但是,男性也不一定就带有性别歧视。很多男性学者对女性主义怀有同情,不仅亲身参与女性的解放运动,而且也认同女性主义的许多政治诉求。在参与女性解放运动的过程中,男性也开始审视父权文化和男性性别身份对男性生活的约束和反作用,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男性研究²,男性研究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女性更好地审视男性气质以及性别关系。一部分男性研究学者通过挪用女性主义的话语和政治策略重新审视父权体制内的男性气质和性别关系,试图巩固男性话语的中心地位,这被肖瓦尔特称为“批评的易装(critical cross-dressing)”³。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的性别,由于生理局限,某一性别的人不可能充分体会另一个性别的经历、遭遇和感受,也因此无法全面理解另一个性别提出的主张。一位男性作家即使再同情女性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亲女性主义者(pro-feminist)⁴。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位男性研究者也很难完全采纳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

5.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虽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但它同其他研究视角之间的关系格外密切,并不是截然分隔、相互冲突的。更何况,女性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首先,前文已经说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是

1 爱德华·赛义德著:《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2 迈克尔·金米尔(Michael Kimmel)认为,男性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亲女性主义者、反女性主义者和男性主义者。参见Michael S. Kimmel, “Who’s Afraid of Men Doing Feminism?” *Men Doing Feminism*, ed. Tom Digb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57-68.

3 Elaine Showalter, “Critical Cross-Dressing: Male Feminists and the Woman of the Year,” *Men in Feminism*, eds. Alice A. Jardine and Paul Smith (New York: Methuen, 1987) 116-132.

4 Brian Klocke, “Roles of Men with Feminism and Feminist Theory,” *Nomas*, n. p., <http://www.nomas.org/node/122>, 3 Aug. 2010.

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异于其他“主义”或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内部的多元主张。学界常常惊讶于女性主义内部纷繁复杂的观察与诉求。《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的著者认为:

在过去25年左右的时间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为卓越地意味着矛盾、互换和争论。的确,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一系列创造性对立——批判与反批判——为基础,永恒并创新地处于流动状态:挑战、颠覆并拓展其他(男性)理论,也挑战、颠覆并拓展自己内部的立场和诉求¹。

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变化和多元态势,使女性主义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有所区别:它不再拥有唯一一种理论模式和阐释方式,消解了“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经典理论话语,转而同阶级、种族、民族、非异性恋等文化身份相结合,生发出许多“琐碎记述(*petits récits*)”,更紧密地植根于某一文化或地域。女性主义这一开放、动态、多元的特征使“女性主义”变成复数(*feminisms*)²。其次,由于男性研究的介入,单纯的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发展为性别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男性研究兴起和发展,它依赖于女性主义而又反过来对女性主义的主张有所反拨。毕竟,某一个性别存在状况是不可能与另一个性别没有关系的。同时,后结构主义理论消解了先前对性别所持的本质主义认识,人们开始更为关注性别的社会建构特征,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主张。此外,随着对于性行为(*sexuality*)和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多元化的认同而出现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以及同性恋文学和同性恋文学批评也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和性行为的简单认识。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³,

1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ed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 123.

2 由休姆(Maggie Humm)编辑的《女性主义理论词典》同时收入“*feminism*”和“*feminisms*”两个词:前者用来概括统称主张女性优越的理念,而后者用来描述女性主义内部对于女性受压迫原因、机制的不同分析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女性主义主张。参见Maggie Humm,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2nd 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an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93-95. 关于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另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银河著:《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100页;以及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89页。

3 性别研究在学界也有争议,参见《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中关于“性别理论与批评”的词条。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420-427.

这一转变并非只是名称上的，而是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拓宽以及研究姿态的宽容，对于主体（性）、身体、话语、书写等问题的探讨也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最后，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有忽视男性利益的倾向，一些学者为保持更为平衡、更易为多数人认可的研究视角，有意在批评实践中把女性主义理论同其他相关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批评范式的多元和跨学科整合。在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对单一研究方法的坚持本身就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特征¹。事实上，女性主义从创立之初就从许多相关学科那里借鉴了一些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社会学、人类学等。女性主义同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发展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乔德罗（Nancy Chodorow）、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为主要代表²；女性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巴雷特（Michele Barrett）、费特莱（Judith Fetterley）和罗宾逊（Lillian S. Robinson）为主要代表³；女性主义理论同叙事学的结合形成女性主义叙事学，以兰瑟（Susan S. Lanser）

1 参见K. K. Ruthven,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5.

2 乔德罗，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有：《母职的再生：精神分析与性别的社会学》（*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1978）、《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1989）和《情感的力量：精神分析、性别与文化中的个人意义》（*The Power of Feelings: Personal Meaning in Psychoanalysis, Gender, and Culture*, 1999）。参见刘岩编著：《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67页。

米切尔，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有：《妇女领地》（*Women's Estate*, 1972）、《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1974）、《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Essays in Feminism,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1984）；文章“千禧之际的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at the Millennium”，1999）等。参见刘岩等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4-478页。

关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另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254页；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139页；以及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129页。

3 巴雷特，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是《今日的妇女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几个问题》（*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1980）。

费特莱，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是《抵御性的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 1978）。

罗宾逊，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是《性、阶级和文化》（*Sex, Class and Culture*, 1978）。

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另参见秦美珠著：《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08年；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191页；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117页；以及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113页。

为主要代表¹；女性主义理论同后殖民理论相结合形成后殖民女性主义，以斯皮瓦克（G. C. Spivak）、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乌玛·纳拉言（Uma Narayan）以及闵哈·特林（Minh-ha Trinh）为主要代表²；女性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的结合形成女性主义生态学，以雷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lson）、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范达娜·席瓦（Vandana

1 兰瑟，美国叙事学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有《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1981）、“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1986）和《虚构的权威》（*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1992）等。

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另参见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307页。

2 斯皮瓦克，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后殖民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有：《在他者的世界里》（*In Other World*, 1988）、《后殖民批评家》（*The Postcolonial Critic*, 1991）；以及文章“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1985）、“从属臣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1988）等。参见刘岩等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8-323页。

贝尔·胡克斯，美国非洲裔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其代表著作有：《文化批评与变形》（*Cultural Criticism and Transformation*, 1997）、《我的女性主义》（*My Feminism*, 1997）、《女性主义死了吗？》（*Is Feminism Dead?*, 2004）等。

莫汉蒂，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是文章“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女性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1986）和著作《没有边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与实践团结》（*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2003）等。

纳拉言，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是《文化错位：身份、传统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 World Feminism*, 1997）。

特林，越南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诗人、电影人，其代表著作有《女人、本土、他者：书写后殖民与女性主义》（*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1989）、《就在那里：当代文化中的边缘化》（*Out There: Margina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1990）、《当月亮变红时：再现、性别与文化政治》（*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1991）等。

关于后殖民女性主义，另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4-363页；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214页；以及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0-165页。

Shiva) 为主要代表¹。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像女性主义这样如此宽容和开放, 它同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多维度的结合, 经过女性主义培养的学者和研究者已经遍布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领域, 其规模、气势、进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构想。

本书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之一, 意图向读者描绘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景观。编著者回顾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 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得失, 运用批评实例展示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有效性、合理性, 以及这一方法同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结合的可能性。由于文本批评实践所选作家都是女性作家, 批评视角又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 当属肖瓦尔特命名的“女性批评学”范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女性经验, 书写女性历史, 观看女主人公如何主宰命运, 体察女性作家如何彰显女性主体。无论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女作家的创作, 都昭示着独立、自主、柔中有刚的女性气质, 故本书取名为“并不柔弱的话语”。

本书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章:

第一章选译了7篇具代表性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编著者首先试图向读者展现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沿革, 从以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和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个阶段, 到以性别差异为关键词的第二阶段, 女性主义理论家区分了性别和性属, 关注女性的生物性特征、女性的独特生活体验、女性话语的自由与束缚、女性心理层面的性别无意识以及女性的社会经济条

1 卡尔逊, 美国生物学家和环境学者, 其代表著作是《沉寂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 1962) 等。

伊内斯特拉·金,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 其代表著作有: “女性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学的女性主义”(“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1989)、《什么是女性主义生态学?》(What is Ecofeminism?, 1990)、《女性主义与生态学》(“Feminism and Ecology”, 1993) 等。参见刘岩等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74-379页。

格里芬,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 其代表著作有:《女性与自然》(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1978) 和《色情与沉默: 文化对自然的报复》(Pornography and Silence: Culture's Revenge Against Nature, 1981) 等。

席瓦, 印度裔学者, 其代表著作有:《活着: 印度的女性、生态与生存》(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Survival in India, 1988)、《生态与生存的政治》(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Conflicts Over Natural Resources in India, 1991)、《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1993)、《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 1995)、《明日的生物多样性》(Tomorrow's Biodiversity, 2000) 等。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 另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等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364-409页; 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214-224页; 以及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165-189页。